

一 一个伟大而陌生的人物

谈到中国文化，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而谈到中国的礼乐传统，就不能不首先想到周公。

在中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上，周公的影响可以说既广且远。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孔子是东方圣哲。周公处在黄帝与孔子之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伟人。作为周朝江山的奠基人，周公不仅辅国安邦，稳固统治，而且创立典制，制礼作乐，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思想更深深影响了孔子等思想家的学说，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先导。

周公是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被后世尊为圣人，历代学者有口皆碑。然而，由于记录周初历史的材料很少，后人对这些有限的材料又理解不一，使

得周公事迹显得模糊不清，再加上上个世纪儒学地位的沉降，对许许多多现代人来说，周公这位伟大的圣贤居然还是一位比较陌生的人物，即使在专门的研究者中，有关周公的事迹也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其实，记载周初和周公历史的资料虽然缺乏，但披沙淘金，透过种种材料的记载，还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探寻出周公事迹的真相。经过学者们的切实努力，周公的历史形象已经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非凡家世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西周初年的时候，周公在谈到自己的这一身份时，曾说“我于天下亦不贱矣”。周公的身份岂止“不贱”，他事实上是当时地位最为尊贵的人。

周公出生在一个非凡的家族中，这个家族便是我国上古夏商周“三代”时期周朝的王族。他的名字与周族的发展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

与夏、商两个部族一样，周族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落。周人善于经营农业，他们的先祖名弃，曾经是尧的农师，与夏禹、商契一起服侍过舜。由于弃这个人擅长耕农，舜帝把他封在邠这个地方，号称后稷。这里临近姬水，因而以“姬”为氏。

后稷是主要负责管理黍稷等农作物种植的农官。在弃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历代的继承人都号为“后稷”，直至夏朝末年不窋之时，几乎与整个夏王朝相始终，可见，长于农业种植是周人的传统。不窋末年，正值夏朝政治衰败的时候，看到当时民众离心离德的实际情况，后稷于是丢弃官职，率领部族，奔到戎狄之间。过了两代，公刘率领族人迁居到了豳地，在这里发展农业。

又过了八代，到了古公亶父时期，周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那时，附近有名为熏育的戎狄部族来逼，古公亶父遂率领自己的部属离开了豳地。他们渡过漆水和沮水（今陕西麟游），越过梁山（今陕西麟游东南），来到了岐山南部的一个平原上。这里自古以来被称为周原，土地肥美，位置优越，他们在这里辟田开垦，不仅人口增多，而且设官分职，建筑宗庙城邑，生产力迅速提高。

古公亶父去世后，其子季历立。季历在位时，积极发展与商王朝的关系，并趁机反击长期以来威胁周人的戎狄部落。但是，周人的强大毕竟对商朝不利，势必引起商朝的警惕，季历本人就是被商王文丁杀死的。因此，与商王朝的关系也成了周人对外关系的主线。

季历死后，姬昌即位。姬昌就是周公的父亲周文王。文王时期，周族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的辉煌阶段。

周人有文王“受命”之说，认为文王膺受了上天之命，奠定了灭商的大业。文王在位时间较长，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继续开发周原，扩大土地面积，自身实力不断增加。由于周的强大，吸引了不少方国诸侯归附，使之在远近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了稳定后方，文王攻讨北边的犬戎和西边的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然后又向东发展，攻伐和征服商的与国。与之同时，文王对商王朝谦恭忍让，以友善相待，为周人争取了扩充实力的机会。他的这些举措，为以后武王灭商准备了条件。

（二）食采于周

姬旦之所以被称为“周公”，是因为后来以周原这块周人龙兴之地为其采邑。采邑与封地相近，受封者可以享受采邑的租税，并不拥有其土地和人民。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就曾说在陕西扶风雍的东北有故周城遗址，并说周本为地名，在岐山的南面，本为太王居地，后来以之为周公的采邑，所以姬旦才被称为“周公”。

在周族的发展历史上，周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直到后世，他们的子孙依然眷恋着这块土地。这支姬姓部族的人居住在周原，从此，他们就被人称为“周人”。周文王即位后也是一直以周原的岐邑为中心

向外发展，到文王末年，才建造丰邑，自岐山之下迁都于丰（陕西户县东）。周原经过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的经营，成了周人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可以视为周人文明的发祥地，不少贵族在这里保有封地，以至于死后归葬于此，这里的宗庙、宫室历经整个西周一直存而未废，直到西周末年戎人内侵时才毁于战火。

周原这样的周族宝地成为周公姬旦的采邑，是他的特殊身份地位所注定的。文王一生有子众多，史书记载文王儿子的封国就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雍、曹、滕、毕、原、丰、郇等 16 国。其中，毛、郕、雍、滕、毕、原、丰、郇八个国家都不是武王同母之弟的封国。

在周文王的儿子中，周公与武王为同母兄弟，他们都是太姒所生。据说，太姒是文王的“正妃”，天性仁惠善良，明于道理。也有的说太姒为继妃，文王元妃为周姜，周姜无子，太姒继之，遂取得了正妃的地位。

太姒的儿子共有十人，《左传》中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加上武王兄伯邑考及武王本人，恰为十人。这十人分别是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郕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

然而，除了伯邑考、武王发分别为太姒的长子和

次子外，史书记载中其他兄弟的长幼次序却有不同说法。如周公与管叔谁是兄长，众多文献就两种说法并存，甚至现在不少学者都难以说清。其实，细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以周公为兄的文献记载可能更为可靠，因为西汉时期的材料已有不少主周公为兄之说，而且东汉以后，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称周公长于管叔。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有“文王十子”，其中明确以周公排行第三而在管叔之前。

更为重要的是，文献的记载中已经隐含了周公与管叔、蔡叔等人哪个年龄较大的答案。如武王病重时，他曾经打算把王位传给周公，这说明周公很有可能是武王各位弟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位。还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称管叔和蔡叔为“二叔”，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思是周公伤两位弟弟之不终，才实行分封，作为周王朝的屏障。有人认为这里说“二叔”是因为管、蔡二人的名中皆有“叔”字，而实际上，这里的“叔”应作为“弟”来理解，这在《左传》中可以找到旁证。

文王诸子中，最有资格继承周文王位置的当然是伯邑考，但他在文王时作为人质在殷纣王那里，竟然被残暴的殷纣王活活烹杀。伯邑考早死，文王的次子发便代替了伯邑考，在后来继承了王位。按照那时的继承法则，太子死去，如果有同母弟弟，就有优先被立为太子的资格，这样，文王死后，继位的便是武王

发，他以次子而取得了嫡长的地位。

既然周公长于管叔，在同母兄弟中排行第三，那么，除了即位为王的武王姬发，周公的地位就最为尊隆。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除了嫡长子继承君位外，其他的兄弟都应该另立小宗，所以国君应封自己的兄弟，使之另立一宗。武王当然也会为各位弟弟立宗。周公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食采邑于周，而被称为“周公”的。《诗经》中有“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的句子，周人也认为灭商大业是太王居住在岐山之南时期开始的，可见，在周人的心目中，周原对于周族的兴盛意义非同寻常。周公食采于周时，管叔尚未为乱而死。武王使姬旦以周地为其采邑，也证明周公在武王众多弟弟中年龄最长。

（三）多才多艺

武王、周公的成长与父母的教育分不开。《列女传》说太姒对儿子要求严格，因此，武王、周公从幼小到长大，从不去做那些邪僻的事情。他们成人以后，文王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终于成就了武王、周公的德行。

在同母兄弟之中，周公的确是十分突出的一位。据《史记》记载，周公恭敬孝顺，宽厚仁慈，与其他兄弟不同。同母兄弟十人，只有武王发和周公旦最

贤，他们是文王的左膀右臂，一起来辅助文王。

周公的恭顺与谨慎是有名的，后人形容他单身独处时都非常严谨，连夜里走路都注意自己的影子要正直。周公侍奉文王，在行动上从不专断，从不擅作决定，他谨慎戒惧，就像身体不能承受轻衣之重，就像天生不能讲话那样不随便言语。他侍奉文王十分周到，婉顺得像不能胜任大事，又好像担心失去什么，可以说恪尽了为子之道。孔子曾经夸奖周公的谨慎，说他实在是太伟大了，他身份高贵却更加恭谨，家里富裕却非常节俭，战胜对手却更加戒备。

关于周公的体态容貌，已经没有多少材料可以详细说明。但据零星记载，周公可能身材不高，而且还有些驼背。周公虽然其貌不扬，但他后来却成为千古伟人，这与他的积极进取密切相关。

周公年轻时便渴求上进，为此，他十分谨慎地结交朋友，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喜欢与比自己强的人相处。他说：“不如我的人，我不与他相处，因为他会成为拖累我的人；与我相同的人，我不与他相处，因为他对我没有益处。因此贤能的人应该与比自己更加贤能的人相处，才会不断进步。”周公想要兼学三代圣王，实践他们的勋业。他常常反复思考，甚至夜以继日，一旦想通了，便急忙付诸实施。

周公的切实努力，使他具备了各种各样的才能。孔子十分尊崇周公，认为周公的才能十分美妙，同时

还不骄傲和吝啬。关于周公的这些说法虽然出于后世的资料，但比较可靠的材料可以与之相互印证，如《尚书》中就有周公自称“ 巧能 ”、“ 多才多艺 ”。周武王也曾经说他“ 大有智 ”，称赞他富于智慧。看来周公具有出众的天赋和秉性，有卓越的才智和德行是没有问题的。

周公还善于学习历史知识，总结经验教训。《淮南子》一书中说文王、周公处处寻求知识，调查访问，广泛观察得失变化，考察利弊关系，以便应付千变万化的问题。他们还把尧、舜等明君所以能够兴盛，桀、纣等昏君所以能够灭亡的道理，都记载在明堂（明堂是那时周人祭祀祖先、朝见诸侯、宣明政教的重要场所）之上，以便提醒自己不断保持清醒头脑。

（四）辅国安邦

周公知识广博，了解历史兴盛变化，惟其如此，他才能洞察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准确把握方向，不仅帮助武王将灭商大业一步一步推向前进，而且使新建立的西周王朝从风雨飘摇中走向稳定，采取一系列的巩固措施，使得周朝统治变得稳如磐石，从而在周公去世以后，周王朝出现了“ 成康之治 ”的大好局面。

周公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又是围绕他的政治实践阐发的。说到底，周公之所以影响后世极大，主要在于他德才兼备，在于他一生辅国安邦的实践活动。

在武王去世之前翦灭商朝的过程中，周公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成为武王的得力助手。在文王去世以后的七八年中，周公尽心竭力，在武王需要的时候，他往往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利用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为武王出谋划策，献智出力，辅助武王顺利完成了灭商的大业。

时势的发展似乎就是要造就周公这位政治家。由于过度的操劳，克商之后不久，武王不幸患病，同时，由于新的王朝刚刚建立，他们面临着复杂的局势和繁重的事务，周公的担子更重了，他不得不更加竭尽心智地帮助武王。克商之后第四年，武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使得周朝的局势变得危急起来，也使得周公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但成王年幼，不能主政，周公作为辅相，以冢宰的身份摄政，担负起辅助成王的任务，全面应对和处理周王朝方方面面的事务。周公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但他的切实努力换来的竟然是恶语中伤，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等人制造谣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闹得镐京沸沸扬扬，连召公奭听了也怀疑起来。成王年龄小，不大懂事，更弄不清楚

是真是假，对这位辅助他的叔父也有点信不过。东方的武庚联合管、蔡，乘机进行叛乱。

在这样的形势下，周王朝的国家机器几乎面临瘫痪的危险。周公心里难过，他披肝沥胆、言辞恳切地向召公等周朝重臣表白，以争取他们的信任。在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与理解之后，周公毅然调动大军，并亲自率军平叛。在消除了武庚以及管、蔡等“三监”的祸患，又平定殷商旧地以后，又率军大举东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消灭了东方的殷遗势力，彻底稳定了东方，为新兴周王朝消除了隐患。

为进一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进行了大分封，将宗室懿亲分封到各地，并以王室重臣、近亲把守个个要塞，以此作为王室的屏藩，周公前后封建的诸侯国家有 71 个。周公又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东），修建王城（今洛阳市内），还将殷遗民迁到洛邑，驻军加以监守。洛邑和王城作为周的东都，称为成周，用以统治东方。周公还着手建立了周王朝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彻底走上了正规。

周公辅助成王，共摄政七年，总算把周王朝的统治巩固下来。这时的成王也已长大，已经可以独立处理政务。周公担心成王年轻气盛，治国时流于荒淫怠佚，于是作了《毋佚》以谏诫成王。周成王七年（前 1036），成王年满二十岁，周公把政权正式交还给成

王，由他亲自管理。

周公在成王初继位时暂摄国政，经略天下，对稳固周朝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

成王七年，也就是周公归政之年的岁末，成王对周公辛勤于王室念念不忘，于是在洛邑举行了封命“周公后”的仪式，将周公之子伯禽分封到泰山之南，建立了鲁国，周公也就成了鲁国的始祖。

归政后的周公其实并没有完全不问政治，他依然关心成王，对他为政治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规劝。归政成王之后，周公依然极受尊敬。成王十一年，受封于晋国的唐叔得到一株异母同穗的稻禾，将它献给成王。而成王则命唐叔献给住在丰（此为“丰镐”之丰）地的周公。

成王十一年（前 1032）年龄大约 60 余岁的周公在丰地去世。周公病危时，他希望自己死后葬在成周，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心存谦恭，把周公埋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为了褒扬周公之德，成王还特许鲁国在祭祀周公时用周天子之礼乐。

二 辅佐武王成就灭商大业

周人灭商而主掌天下，是殷周之际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周人灭商的事业是逐步完成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周人看来，古公亶父时期在周原的发展，已经意味着“翦灭”商朝行动的开始。到文王时期，周人隐忍待时，谨慎地修复与商王纣的关系，但在暗中，却不断蓄积实力，逐步进行克商的各种准备。他们积极主动地加紧外交，争取同盟，孤立商王，以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

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父位，继续进行灭商大业。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周公一直是武王的得力助手。

（一）《逸周书》的记载

在关于周公事迹的记载中 最原始、最可靠的要

数《尚书》和《逸周书》两部典籍。《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有 12 篇与周公有直接关系，《逸周书》则有 21 篇出现了周公的名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逸周书》的记载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关于周公的材料自然也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十分悠久，史官记事制度也由来已久。夏商周三代时期，每个王朝都有一些历史记录流传下来，到了周代，人们的历史意识增强，从而对这些文献加以整理，于是便有了大量的“书”在周王朝和诸侯国中流传。到了孔子，为了发挥“书”的教化作用，并用以教育弟子，他曾对这些大量的古代史官所记录的“书”加以断限和选材，编成了 100 篇的《尚书》。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仅仅是孔子所编《尚书》的一部分。

《逸周书》与《尚书》本来是同一类的内容，人们开始并没有把二者分开。《逸周书》本来的名字叫做《周书》，其材料系孔子删订《尚书》之余的“周史记”。书中所记载的史事，上自商朝末年的周文王、武王时期，下到春秋中期的周灵王、景王时期，内容十分丰富。从《左传》、《战国策》等早期的典籍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常常征引现存《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往往称作引自《书》或者《周书》，与后来被称作《尚书》的各篇没有什么区别。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这部书 其题目就是《周书》，

被列于《六艺略》的《尚书》各家之后，从中可以看出它本来与《尚书》具有同等的地位。

可是，到了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渐渐忽略了《逸周书》的价值，其地位也慢慢降低。虽然也有目录学家把它列入“书”类，但更多的则列之于史类，《隋书·经籍志》开始把它列在“杂史”之首；清代修《四库全书》，则把《逸周书》收入到“史部”的“别史类”中。这样的分类事关重大，因为在古代人们重视经书，这样，《逸周书》的地位与在经部的《尚书》形成了巨大反差。

《逸周书》问世以后，也有人对此书有所留意，却多数是进行文字的校勘，很少人能对此书作综合研究，所以后来有人称该书“千百年来未有专家”，基本上符合实际。自清人朱右曾作《逸周书集训校释》以来，《逸周书》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现在也有学者倾力加以研究，但与此书的重要性相比，人们的研究还显得有些薄弱，它还应该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逸周书》中大量的内容属于文、武、周公之政，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也都十分推崇“文武之政”。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出了尧、舜、禹、汤以及文、武、周公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影响。在孔子那里，尧、舜、文、武是圣王名君，他

特别向往周代的礼乐制度，所以他对于文、武、周公更是十分推崇，孔子的弟子子贡便说孔子学修“文武之道”。

文王是周政最主要的创始人，周公也动辄引述文王的言语，对于文王，孔子自然情有独钟。即使在周游列国途中被围于匡时，孔子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由此可知，孔子是以文王之道的担当者自居的，或者说可以说他自认是文王之道的传人。

《中庸》又记孔子之言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指方版，“策”即册，指竹简；“方策”泛指典籍。这句话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治都明白地记述在方版和竹简的典籍上。《逸周书》乃是后人根据古代“方策”写定的，只是其中个别的言语可能由写定者改用了当时通用的词语，基本内涵却不会发生大的改变。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巨大冲击，不少本来已经比较清楚的历史问题反而模糊起来，许多历史文献得不到正确认识。与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密切相关，学界对不少上古文献如《周礼》、《六韬》、《古文尚书》等的成书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也影响到了人们对《逸周书》年代问题的看法。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人们正在不断超越疑古思潮的束缚，逐步走出迷茫，对中国的

上古文明进行新的估价 对于《周礼》、《六韬》、《古文尚书》等书的认识也会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周礼》一书，旧说为周公所作，现在相信此说的人很少。不过，由于文物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及学术研究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此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人们认识到该书的记述都有历史的根据，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出于后来“大国主义”者的设计。有的研究者认定《周礼》“只能出于一人之手”如果是这样，这位作《周礼》的人是否周公，就很值得认真探讨。

学术的进步自然也有利于对《逸周书》本来面目的探讨。例如，人们怀疑《逸周书》的一些篇章时代较晚，往往主要是认为“文字不古”，似有后代词语。如《逸周书》的《柔武》中有“德”、“义”、“信”等；《小开武》中有“五行”说；《宝典》中则有“信”，“义”，“仁”，等。其实，仁、义、圣、智、德、信、孝、慈等等概念西周时期已普遍运用，《周礼》中这样的词语就有不少，如西周的师儒与教化便对此涉及很多，地官之“大司徒”职中的所谓“十二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德”、“六行”、“六艺”，国子教育中的“师氏”、“保氏”所掌等等，都是道德教育与礼仪教育相结合的，其中就出现了不少“仁”、“义”之类的概念，这正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渊源所在。看来，以所谓的“文字不古”而确定《逸